

铁马热血唱大风

□汪政

继《敦煌本纪》之后，叶舟又一部百万字的长篇巨制《凉州十八拍》面世了。这样的体量在近些年的长篇小说创作中是少见的，是一个浩大的创作工程。当长篇小说达到一定的体量之后，就不仅是一个篇幅问题，所谓“量变带来质变”，它的性质也会随之发生变化，从主题的开掘、素材的积累与选择、人物及人物关系，特别是情节安排以及与之相关的叙事结构都会是一种“超级”存在。

如果硬要去简单地概括《凉州十八拍》的内核，我以为它是一部向古典文化、向经典、向中华人文精神致敬的作品。其实，不仅是因为叶舟生长在西部，他的创作起步于西部，更重要的是他对西部、对河西走廊、对丝绸之路的重新发现。他以一系列的写作唤醒了那片沉睡而神奇的土地，让我们关注到中古文化南迁之前那片文化原乡的意义。用叶舟的话说，他要用自己的写作擦亮那一块“锈带”。为了这一宏大叙事，他不得不构筑起一个长篇的巨型建筑，选择浩然正大、苍凉悲壮的风格，启用古雅与地方语混杂的语言，尤其是对经典的化用，使这部作品呈现出复调深邃的复调叙事。小说取名“凉州十八拍”，显然来自传诵千年的《胡笳十八拍》，这首古诗结合的汉乐府经典是为民族和解、远嫁匈奴而后又归汉的蔡文姬的泣血之作。这首诗作与《凉州十八拍》的题材有着天然的文化亲缘关系，对它的借用不仅为作品赋予了久远的时空色调，而且为作品找到了叙述的旋律，虽然是书写，却把读者自然而然地引入声音的审美境界。叶舟如同一位行吟诗人，以茫茫的西部大地为背景，在苍凉的乐声中开始了他的讲古。

与叙述内容相关性极强的是作品对《赵氏孤儿》的化用，可以说，《凉州十八拍》就是一个“托孤”的故事。说它是一部繁复深邃的复调小说，也是因为了它的九重托孤。第一重托孤是铜马。铜马铸造于汉代，为的是祈祷上苍消弭灾祸，保天下太平。当年一共铸造了七尊，分埋于河西大地，每当大乱，铜马显灵，而谁拥有了铜马，谁就会得河西天下。《凉州十八拍》里非常重要的线索，甚至可以称为主线的就是各方势力围绕铜马展开的生死较量。军阀、地方政府、土匪与民间，各种力量为了铜马上演了一场又一场生死战。在这部作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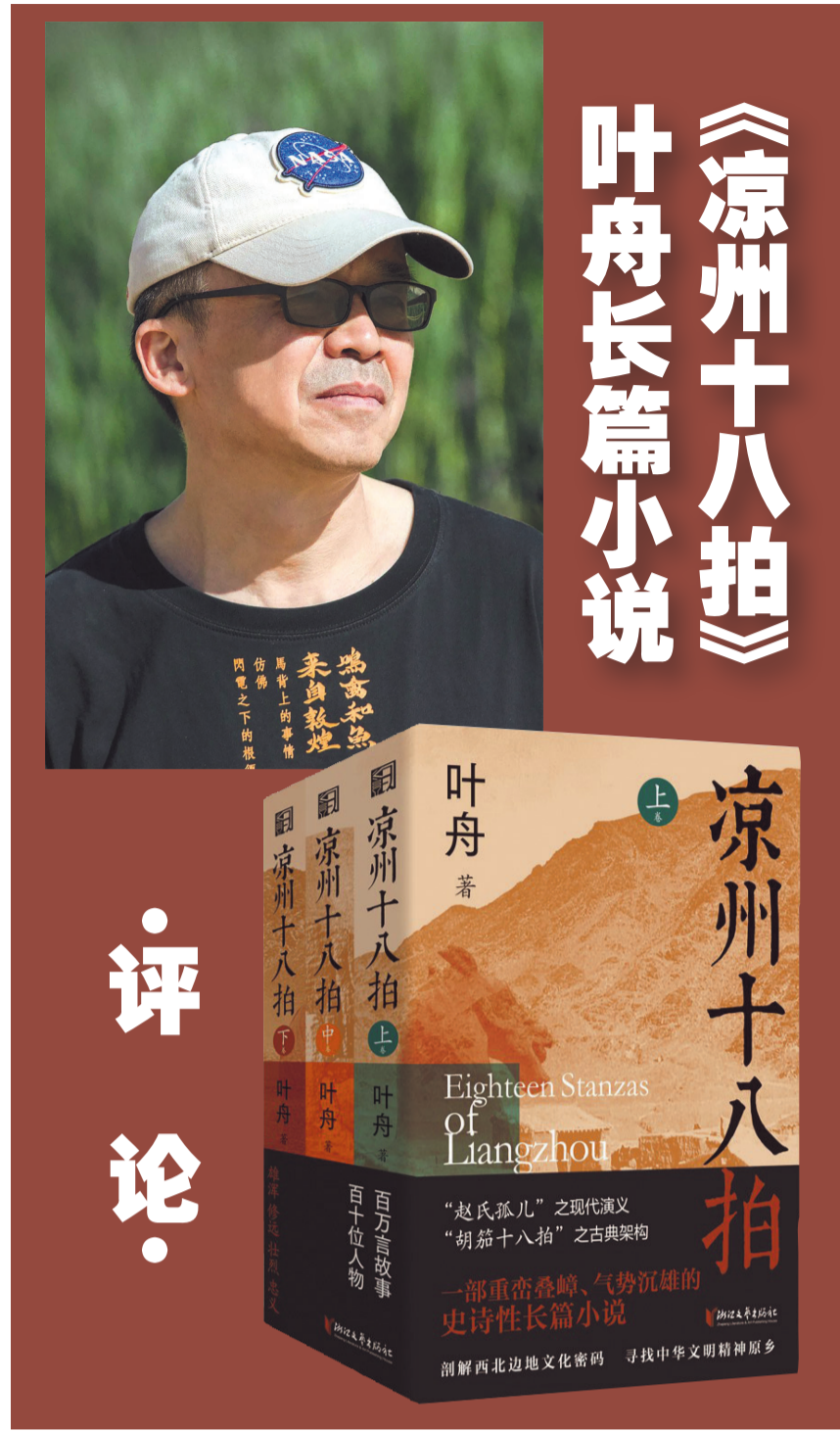
中，铜马是一个重要的文化符号，如同图腾，也如同号令金牌，从盗墓者手里无意中得之，到续家，再到左家，又回到续家，最后托付给了权家，最后由权家的女婿顾山农守护。对顾山农来说，这是重于泰山的嘱托，是关系世代文化传承的命脉，也是关乎河西大地安宁的压舱石。为了这一重托，顾山农忍辱负重，苦心经营，称得上“卧薪尝胆”。第二重托孤是为了保全续家的香火徐惊白。当年，正是为了保住铜马不落入军阀和土匪之手，盗马贼集团几乎将续家灭门，只留下了刚出生不久的儿子徐惊白，连同铜马一起，先后托付给了凉州权家，而续门的兄弟们则结成了生死同盟，隐性埋名，蛰伏在凉州城内，守护着他们的少东家，千辛万苦，前赴后继，直到徐惊白长大成人。这一层最接近于“赵氏孤儿”母本，其象征意义也更接近于中华文化血缘关系的家族传承，无疑是对河西文明赓续的本真诠释，也是对新生力量的希望与信心所在。再一层托孤是沈阁兰母子。与前一条线索相比，这条线显然偏重于现代文明，不仅因为沈阁兰是北平的大学生，而且因为与她发生亲密关系的马超、刘北楼等人也都是河西新兴力量的代表。沈阁兰因为寻兄来到凉州，不想落入了军阀的手中，最后带着身孕也被托付给了权家。最后一层托孤就是红军西路军。《凉州十八拍》的故事时间是从晚清到现代，集中于共和至上世纪三十年代中期。小说的最后，红军北上，西路军遭到重创，为了保存残存的革命种子，在党组织的领导下，以徐惊白、刘北楼为首的河西进步人士克服重重困难，从马家军手中将红军战士营救出来，辗转送往延安。这部作品的故事虽然复杂，但万川归海，九重托孤的结点都收拢在权家，收拢到了顾山农的承平堡。多重托孤、多重文化，起于古典而结于革命，演绎成了一部中国近现代的史诗。

《凉州十八拍》是对古典的致敬，同时也是一部新生之书、少年之书，一部突破了传统的成长小说。其实包括《敦煌本纪》在内，虽然叙述的时间久远，包孕着化不开的传统文化，但它们都洋溢着强烈的少年情怀、青春的热情和成长的渴望。这里面有着叶舟对传统、对敦煌、对河西走廊的理解，虽然故事中的河西不再水草丰美、人烟稠密，成了一条“锈带”，但如同那尊埋在地下的铜马一样，它始终是年轻的、青春的，始终是张扬的、冒

险的、进取的、血性的。当时的西部虽然凋敝，却是不老的，仿佛停留在边塞诗中，始终显示出一种汉唐气象。在《凉州十八拍》中，这样的情怀与气象是徐惊白和与他一起成长的小伙伴，他们从一群到处惹是生非、不谙世事的顽劣少年，一步步成长为敢于牺牲、具有忧患意识与家国情怀的热血青年。而年轻的精神激荡在作品中各个年龄段的人物身上，他们是尹先生、朱先生，是马超、刘北楼，是北疆“死士”、凉州刀客。是故，要重新定义青年写作，重新定义成长小说。文化与美学意义上的青年不一定是生理年龄上的青年，成长小说更不应该只是通常意义上生命个体从小到大的养成。甚至，青年也好，成长也好，其主体不一定是人物，它可以是任何一个主体，诸如社会、时代、民族、国家与文化精神。所以，《凉州十八拍》将笔触伸向辽阔的西部，伸向远古的年代，从“胡笳十八拍”唱起，召唤出永远年轻的精神与力量，让一种成长的力量灌注到当下，再次奏响奋进、抗争与永不言败的新的青春。

不仅是人文精神，同时也是一种审美方式，《凉州十八拍》体现出一种奔涌浩大、敢于进击的气息。这样的态度需要一方舞台，这个舞台就是作品的一百四十万言。有了这阔大的舞台，叶舟可以在上面上演令人头晕目眩的花式叙述，呈现出杂糅了各种腔调的复调叙事。小说的叙述底色当然是现代的，是在西方小说叙事体式影响下定型的白话新小说。但在以此叙事主声部的同时，我们体会到了史传的叙事智慧，感受到了民间文学的古朴浑厚，它的节奏无疑有白话说部与章回小说的影子，而故事套故事的手法显然受到了文言小说的影响。上世纪80年代的先锋叙事给了叶舟叙述视角上极大的自由，可以不断地变换叙述视角，在转述与呈现，在顺叙、倒叙、插叙、补叙中自如切换。我们不时可以看到非虚构的笔法，甚至穿越、悬疑也在作品中有了立足之地。

我以为，这才是长篇小说的气象与本性。长篇小说就该有这样一种精神，有众多的人物、宏大的主题、史诗的题材和海纳百川的审美气度。它不需要纯粹，相反，应该摧枯拉朽，万物皆备而生生不息。幸运的是，叶舟与这样的长篇相遇了，他振衣河西，铁马热血唱大风，为这个时代奉献出了难得的黄钟大吕。



· 评论 ·

我向往一种深情主义的写作

——《凉州十八拍》创作谈

□叶舟

家、落户兰州之后，便很少再回去，但他一辈子乡音未改，就像一枚标签，说明了来路与身份。我放弃了为《敦煌本纪》撰写续集的打算，发愿要抓紧时间给父亲写一部长篇小说，作为一个儿子的报恩与行孝，这本书当然要以“凉州”为原点。

其实，在我成长的过程中，父亲经常用他的方式，向我描述一个远方的故乡，虽然模糊，但亲切无比。加之街坊邻居、父亲的同事、我的同学和朋友们当中也有不少的凉州人，使我对这个群体有了一个整体性的认知。因为工作的缘故，我每年都要奔赴几趟河西走廊，最长一次在武威住了两个多月。行走、踏勘、考察，包括平时对这一方面史料的大量阅读，让我产生了一种初步的信心，似乎隐约看见了这部书的雏形。

但是，这一切又何其难也，故事就像一堆乱麻，我根本找不见线头，也就是说找不见第一句话。不过，这个问题还是父亲帮我解决的，在他生命最后的余光中，我跟着弟弟妹妹轮换着陪护他。到了我值班的晚上，伺候他入睡后，我就躺在父亲的身边，悄悄地翻看一些资料，然后再轻轻的纸张声还是会吵醒他。每天夜里，父亲总要起来吸氧，长时间地吸氧，这恰巧就是父子之间说话的契机，我总是问这问那，大到过往的历史，小到他幼年时的饮食、服饰、方言、村庄的规模、各个家门的情况，等等。《凉州十八拍》的时间背景相当契合了父亲的童年与少年，待成书之后，我宁愿相信奔跑在当年凉州天空下的那一帮儿子娃娃当中，有一位就是我的父亲。

那天深夜，吸了一阵子氧气，父亲忽然拔掉了鼻管，对我说了四句他自己整理的《凉州宝卷》：“天凭日月，人凭心，/秤杆凭的定盘星；/佛凭香火，官凭印，/江山凭的是忠义。”这句话里带钢，充满了钙质，有金属之声，我当时惊得目瞪口呆，赶紧抄在了纸上。我知道自己抓住了那一根线头，找见了整个故事的腔调，也摸见了这本书的心跳与核心要义。这是父亲的加持，更是凉州的赐予。

新书出版时，我的确用了一页雪白的纸，将父亲生前整理的这四句话单独呈现了出来。我还在开篇引用了《钦定四库全书》甘肃通志卷中的一句话：“人事慷慨，烈士武臣，多出凉州……崇节俭，敦礼让，质而不野，尚武兴文。”事实上，这两页笔记恰恰形成了《凉州十八拍》的精神空间、灵魂质地与少年气息，这也是我在漫长的书写中能够坚持下来的动力所在。悲伤的是，在这部书稿写到了一半的时候，2020年7月20日，我父亲撒手人寰，他没能等到这本书的面世，我恍惚成了孤儿，《凉州十八拍》也成了孤儿，无人认领。在后续的写作中，我吞着泪水，尽力抢救这部书稿，就像《赵氏孤儿》里的义士程婴那样，从来也没有过一丝的动摇。今年元月，除夕的早上，我在父亲的墓前敬献了这套书，终于兑现了当初对他的诺言。我想，每一本书都有自己的使命，无论作者出于什么样的意志去写这本书，冥

冥之中真是有一种深情主义的元素。

凉州乃是河西首郡，也是西域之门户。我以为，自古以来，河西走廊就是我们这个国家的心腹地带及仓储之地。它不仅提供了一种地理上的战略纵深，而且还提供了一种文化的纵深、思想的纵深。但是，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这一片疆域渐渐地板结了、荒凉了、天远地偏了，成了不毛之地，成了一块生锈的地带，无论从精神和意志上来讲。我写过大量的诗歌，包括后来的《敦煌本纪》和《凉州十八拍》，我渴望用自己的这一支笔去除锈，对，就是除锈。

是时候了，我就想在《凉州十八拍》这个庞大的故事里，在河西走廊这一片当年中国的孤悬危角，喊出一帮少年，让他们去撒野、去淬火、去失败、去进取，而后凛然天地、热血人间，成为一群真正的儿子娃娃。在我看来，这样的禀赋和气质恐怕只有在边地与旷野之间才能完成，凉州恰巧满足了我的全部想象，同时也可以安放下那一群永不安分的少年，去迎面一个剧变的大时代。

“救孤”只是《凉州十八拍》里的线索之一，这个故事看似有两个层面。一个是北疆贩马集团续门被满门抄斩，但主人的遗孤被五名忠仆救了下来。这些义士一路躲避追杀，南下进入了武威城，只为了让少主子能够活下来，他们在十几年的光阴中一直隐性埋名，不事声张。另一个层面，待这个孤儿长大成人后，他又决意去救别的孤儿，去拯救沦落在险境当中的红军，也就是西路军战士。实际上，那时的中国也形同一名“孤儿”，内战频仍、山河破碎、民心瓦解，急需一种不畏死、不屈服的少年精神，去收拾残局、去重振魂魄、去寻找光明之未来。这个故事当中频繁出现了一个切口，问这个孤儿原本姓什么？回答说，姓续。什么续？答复说：续命的续，续香火的续。我以为，这才是《凉州十八拍》真正的精神底色，也是整个故事的脊梁骨。

是，就连我这样的作者也在一遍遍地追问，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立场、判断、爱憎和取舍，让那一帮野性未泯、披毛戴革的死士放弃了杀戮，丢掉了血腥，在当年的凉州咀嚼着痛苦，将耻辱和仇恨当成了一种日常的拌料，谨守着内心的律令，却又按兵不动，寂寂无名？忠义是一粒陈词，习性只是借口，生存也不过是寄托，当那一道深远的孤光划过时，我认出了布满夜空的那一种巨大情愫，其实那是深情主义。

因为赶路、因为奔波，也因为生活，我们往往躬身于日常的琐屑当中，我们时常屈膝于一地鸡毛的尘烟里，忘了直起腰板、忘了举首问天、忘了打心自问，包括我们这个时代的人际、交往、阅读与书写，甚至是想象力和进取心，渐渐地滋生出了一层苍苔、一抹锈迹。但是，那些在长路上的趟行之人，那些马不停蹄的驿使，偶一驻足，便会看见巨大的夜空泌下来一粒又一粒璀璨的星光，如水、如蜜、如酥油、如恩情。

这种深情主义，天知、地知、你知、我知。

无尽的远方和无数的人们

□王侃

这部小说的叙事主干涉及的时间跨度不算宏阔，但凉州、敦煌、酒泉、祁连山、嘉峪关等地理名词，以及鸠摩罗什、萨迦班智达等历史人物，统统自带年代感的纵深感，苍凉、辽远、厚重，有着伟大地理和伟大文明的双重加持。承载着悠远绵长历史的河西大地，终于在20世纪，在“共和”“革命”的时代巨澜中，天坼地裂、山河板荡。若非对这伟大地理和伟大文明有着了如指掌般的谙熟和披肝沥胆般的挚爱，断难以如此庞大的篇幅、如此遒劲的笔触精细、生动、酣畅淋漓、深切入骨地描摹出河西大地在20世纪上半叶的历史性震荡。从这一点来看，说叶舟既是文学的赤子，也是河西大地的赤子，实不为过。不过，更需要指出的是，我们在《凉州十八拍》中所见的并非只有乱花迷眼的市井风物，也不只有河西走廊上摄人心魄的历史沧桑，更不止有那些纵横交错、曲折跌宕的怪诞情节；更为重要的是，我们还看到了叶舟将河西大地上纷扬的历史碎片织锦一般呈现于笔端，同时将他对河西大地历史的内在体认作出了有机而丰沛的表达。

《凉州十八拍》是一部有深刻历史见地和诚恳历史态度的大书。小说开篇不久，一个从上海赴西北考察的记者带来的便携式相机，使顾山农这些人也大受震撼。顾山农立刻意识到，凉州、河西已被现代科技、现代文明远远甩在了身后，孤悬一隅，形同弃儿，俨然已成“锈带”。武威城里的公学私塾都难堪现代教育的大任，就像凉州地界的军阀、官府以及郡老制，都已是窒碍“共和”的顽障。顾山农对待朱绣这样的宿儒，态度复杂，他既尊重旧日士子士人身的价值理想，敬重他们在知识开蒙、文化传承方面的历史贡献，但同时深知他们在现代启蒙意义上的力有不逮、除锈乏能，从而待之又不免轻慢。承平堡建设之初，拟作“五凉书院”，是规模蔚然的新式学堂，但形逼势格，在军、政两界的挤压下不得不挪作他用，以救解“山河板荡”的燃眉之急。这极富象征地喻指了近代以来中华民族在启蒙与救亡两大主题之间遭遇的历史纠结，也喻指了近现代以来中华民族的摆脱历史纠结、历史困境而寻觅出路时遭遇的身心之痛楚。叶舟的这种历史体认通过顾山农等人以及通过对某些历史事件的讲述，常以内省的方式展开，为小说植入了一种难能可贵的历史主义气质。小说着墨最多的另一人物徐惊白，他的成长、蜕变，围绕他而展开的关于北疆死士团的极具传奇的悲壮故事，是对“慷慨”“烈士”等关键主题的叠加渲染。这些人物和故事向我们昭示了蕴藏于河西走廊、祁连山南北、大漠戈壁的某种惊人力量，既是守护生命的不竭勇气，也是存续血脉的不屈信仰，同样象征性地喻指了一种大地般浩瀚而沉默的民族精神。这一民族精神在共赴国难的壮举中淬火般耀眼，喻示着这一民族精神将为“启蒙”和“救亡”注入崭新的内涵，并重新定义它们。

除了在结构上化用古曲的匠心独具之外，这部小说的叙述语言也颇可称道。由于采用了旧时说话人调式，小说的叙述语言文白相间、雅俗互见、语体庞杂。整部小说是大河滔滔的语流，境开闢阔、水体雄浑，其中有信手拈来的唐诗宋词，也有脱口而出的村言野语，雅可上天、俗能入地，古今一体、文质并兼，有声有色、张弛有度，既叙事又兼抒怀，声调里带着地域的标识，衍为文字仍携着本土的口音。难得的是，如此繁复的语体皆默然相契、浑如一色，使人不得不惊叹于作者不凡的语言功底。

《凉州十八拍》使“西北”大张旗鼓地涌入我们的视野。它以与众不同的卓越方式使我们想起无尽的远方和无数的人们。这是一部关于伟大地理和伟大文明的史诗。

■ 创作谈

终于写完了、交稿了、出版了，在长达47个月的路途奔波中，我几乎没有歇息过一天，昼夜跟凉州在一起，和那些伴当（伙伴）们生死不弃，形如一家人。但是，我的工作似乎还没有完成，哪怕是入夜之后，我都在思考那一带来自北疆救孤团的死士，何以在十几年的光阴中隐性埋名、含辛茹苦，蛰伏于武威城中，盯着着恩人的家门，观望着自己的少主子渐渐长大，却又放弃了动手？其实，答案是很现成的，草蛇灰线、伏脉千里，悉数隐藏在字里行间，然而究问就像一座断崖，壁立在侧，迫使我再一次写下这个话头。

深情主义，这个词突然像孤光一般，照亮了我的整个夜晚。

2018年，在我写完《敦煌本纪》之后，我已经开始着手下一部的课题了，下一部就是《敦煌本纪》的续集，这个系列被我称之为“丝绸之路三部曲”。其实，故事当时已经构思妥当了，但我对敦煌周边的几个地点尚无把握，需要再去走一走，这也是我写作的习惯，否则就难以动笔。离开苏干湖，从当金山口疲倦地下来，我入住在敦煌山庄，休整了几日。每天午后，我都喜欢坐在摘星阁下的那一片石头院子里晒太阳。我有一个执拗的看法：敦煌的日光，一定有别于他处，它不单单是太阳施舍下来的，还应该是莫高窟放射出来的，带着佛性，带着启示，带着十足的重量，笼罩在我的身上，犹如一种秘密的加持。

很奇怪，我本来是一个急躁的人，但是置身于敦煌的日光下，我却变得格外安静，什么也不想，什么也不做，就好比是一疙瘩面团，在慵懒的发酵当中。不料，那一天接到了父亲的电话，打乱了我敦煌的行程，也就此改变了我日后的写作。

这个电话开启了我报恩行孝的过程，这也是写作《凉州十八拍》最初的缘起。事实上，在将近四年的持续写作中，我一直都有一个隐秘的心愿，在将来成书的时候，专门腾出一页雪白的纸，上面只有一行文字：献给父亲大人。但是，这一切都愿望成空，在《凉州十八拍》写到一半的时候，父亲丢下了我，丢下了这本书，驾鹤西去，魂归道山。

原来，在我上了当金山口、进入祁连山以后，信号皆无，跟家里失去了联系。而平时，我每天都要给父母打几个电话，问候他们的起居与饮食，这已经成为了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在那个敦煌的午后，父亲打来了电话，知道了我的行踪，叮嘱我注意安全。然而，我从父亲说话的气息中，却意外地发现了另一种状况，那就是衰老。父亲是1932年出生的，当时已经86岁高龄了。我在敦煌的日光下惊醒了过来，立刻终止了行程，返回兰州。

我觉得一个人的衰老，肯定是从气息上开始的，看见父亲昼夜在吸氧，已经离不开那个制氧机了，我就知道自己该干点什么。凉州、大柳、双树，这是我父亲的祖籍，他从20多岁离开老